

大国周边外交专题

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 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

叶海林 李铭恩

内容提要：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效应相互叠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调整“印太战略”收紧对华政策，不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的“印太战略”摆出了“常山之蛇”阵势，这一战略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心的缺陷，很难充分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然而，它仍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这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

关键词：周边外交 印太战略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李铭恩，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3) 01-0028-22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深入推进“印太战略”，对华政策显示出更为强烈的对抗性，中美关系愈发缺乏弹性。中美关系的下行趋势不仅意味着中美双方面临互动方式的深度调整，同时也使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更大挑战。从中美及中国周边三方的关系组合角度看，中美对抗直接导致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安全压力增大，同时也间接影响着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中国对周边地区战略既肩负着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任务，也承担着维护好中国周边环境的任务，战略推进面临着来自美国对抗行动的压力，如何避免中国与周边关系遭遇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干扰和破坏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来自他者的外部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周边外交态势的未来发展和演化，这使得研判美国“印太战略”的布局及其对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影响成为中国加强对美博弈、深入经略周边的关键。

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强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对周边地区的外交工作，一直将周边作为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点和优先方向。特别是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国周边战略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伙伴关系得到质的提升，经贸关系逆势上扬，热点关系得到有效管控。“周边邻国始终是优先方向”^① 的基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快速发展，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从中国对外工作布局的空间维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周边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的可靠战略依托。”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时间维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

^① 《王毅表示周边邻国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9 年 7 月 18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7/18/content_5411457.htm. [2023-01-25]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① 新时代中国外交整体框架中周边的首要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和突出。

由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在处理周边外交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的总方针，用“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沉稳应对周边变化。

周边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策略的落实。在总方针的指导下，引领多边主义、推动一体化进程、提供公共产品等具体策略不断得到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坚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② 这些切实的政策体现了中国积极作为的态度，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加大了话语权。

道义领先，命运共同。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外交环境发生很大变化。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客观上要求中国的周边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为推动周边外交再上新台阶，作为周边战略的重要内容，“周边命运共同体”概念应运而生。习近平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指出“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上述论述标志着“亲、诚、惠、容”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周边外交工作

^①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年。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2023-01-25]

新理念的提出和形成。^①

此后，习近平周边外交指导思想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与周边外交目标相适应的具体理念和主张并为之付诸实践。突出道义原则是这些理念与实践的共同特征。中国始终高举发展大旗，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从不追求一国之发展，“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面对席卷全球的疫情，中国坚持“病毒不分国界，只有所有国家都走出疫情，才是全球抗疫的最终胜利。”^③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和赤字，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积极推进中俄友好合作，改善东北亚地区秩序，深化东南亚国际合作，促进南亚地区对话协商，深化中亚地区政治互信。

伴随着有关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概念和具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周边外交也取得了一系列实际成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多样化发展成为共识，多边主义号召力加强。在2020年以来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率先有效控制了疫情，实现国内经济复苏与复工复产，为援助亚太国家抗疫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一方面凭借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为亚太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提供必要医疗物资援助；另一方面通过参与“中韩联合防控机制”“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等双多边疫情管控机制以及一系列重要和急需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等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通过深化抗疫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地区国家凝聚力。随着区域内国家合作应对疫情进程的深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共识不断为亚太国家所接纳，“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得到丰富与发展。

① 习近平：《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10月2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2023-01-25]

③ 《开启后疫情时期周边外交新征程——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外交部网站，2020年10月16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bdfyyq_699171/202010/t20201016_9278750.shtml。2 [023-01-25]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进一步强化了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向周边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作为地区大国，中国在逆全球化过程中依托自身经济体量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发展。2020 年，中国和东盟实现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目标，双边贸易规模突破 7000 亿美元，稳居地区经济的核心地位；同时，中国还是东盟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年均投资额增速为 20% 以上，有力地推动了东盟经济发展。面对美西方基于一己之私，推行单边主义，破坏全球化进程，导致全球增长动力下降、经济形势下行的严峻局面，中国承担了更多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责任，提出了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区域和全球合作理念。域内国家大多与中国制定了双边发展规划，中巴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的相关合作不断深化，带动大量资金和技术涌向周边国家，大大加快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

在地区一体化方面，中国利用自身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优势地位，以产业集群为导向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2020 年末，中国与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 成为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其签署将大大加快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经济合作上，中国对策略收益预期评估的主要计量方式是基于绝对增加值的，并不特别关注中国和亚太国家在合作收益中的相对关系。在中国看来，只要深化地区合作的大趋势保持稳定，中国总能从合作当中获益，相对于周边国家，中国具体获益多少并不特别重要。在此过程中，中国主动迎合发展中国家“走出落后、迅猛发展”的内在愿望，赢得了更多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奋发有为的外交经略为中国在周边抵御美国不断加强的战略挤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周边外交大发展时期的周边外交研究：关注重点和研究热点

中国周边外交活动热度的快速上升给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周边外交的研究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案例，激发了学术界的讨论热情，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中国周边外交进行总体判断，包括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基本走向、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调整和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关键变量；二是对中国周边外交进行多方面、系统性的对策分析，涵盖地缘政治安全、地区经济合作以及综合性策略等多种思路。

在对中国周边战略进行总体判断方面，学术界高度关注对周边外交的现

状研判这一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在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周边环境近年来呈恶化趋势。周方银指出,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不容乐观,中美邻实力结构的变化使中国面临来自美国和周边邻国的双重压力,地区二元结构使中国在经济、安全两个领域都要承受巨大且性质不同的压力。^① 陈小鼎进一步提出,实力增长所引发的全球与区域层面的双重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改善周边关系的成效,同时,制度高度重叠竞争与地区认同水平低下加剧了周边环境的恶化。^②

在中国的周边战略调整方面,学术界更加强调中国“主动塑造”的因素及其形成机理。高程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周边战略正在向主动作为的大方向调整。面对周边力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这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③ 王俊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周边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重要性提升,中国政府将周边外交放到与大国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国外交由此前的“一个重心”变成“两个重心”。^④ 周桂银把当前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总体外交的大框架或总布局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新型大国关系的运筹和努力,二是“亲诚惠容”理念指导下的周边外交谋划和举措,三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战略布局和项目推进。^⑤

最后,学术界非常重视剖析中国周边战略的影响因素,认为大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关键变量。孙雪峰和张希坤认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信誉与中国对周边的战略安抚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互动的两大要因,特朗普执政期间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的美国战略信誉下降,加之中国不断强化战略安抚,塑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趋稳向好的喜人局面。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战略信誉回升将为中国持续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

① 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28-42页。

② 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37-55页。

③ 高程:《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第32-48页。

④ 王俊生:《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167-173页。

⑤ 周桂银:《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未来重点》,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75-91页。

带来不确定性。^① 赵干城强调, 印度是中国西南周边最重要的近邻, 也是中国周边地区战略形势演变的一个常量。但随着印度的快速崛起, 其对中国周边战略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②

在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具体行动策略进行评估和分析方面, 近年来, 学界在中国周边治理方略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多从地缘政治、地区制度和综合思路出发, 不但着重分析既有战略的得失, 而且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的对策建议。

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 党锐锋与曾辰认为, 可以通过“北合”“西进”“南融”“东稳”战略, 创造一个友好、和平的周边环境。^③ 沈丁立提出“双环战略”: 第一环就是中国第一周边区, 即以中国为中心, 与中国直接相邻的 20 个国家, 包括 14 个陆上邻国和 6 个海上邻国; 第二环区由第一环外与其直接接壤的亚洲国家组成, 包括伊朗等国, 中国宜采取“合作与扩展”的战略。^④ 张文木提出, 中国与周边互动中能成为中国战略“棋谱”中支轴国家的有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西南亚的伊朗, 并着重强调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的意义, 而印尼则使中国东南亚政策有“中心开花”之效。^⑤

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 学界也提出通过构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塑造中国周边秩序。傅梦孜认为, 中国不需要做周边现存秩序的颠覆者, 而是在继续参与现存秩序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同时, 通过构建新的机制完善地区与周边秩序。^⑥ 王俊生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讨论其与中国周边战略的关系,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中国新时期周边战略上具有更大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中国周边会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独立领域, 周边实际上会成为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战略资源, 将大大改善中国与周

① 孙学峰、张希坤:《中美战略选择与中国周边环境变化》, 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9 年第 5 期, 第 10-16 页。

② 赵干城:《中国周边战略中的印度因素》, 载《国际展望》, 2014 年第 2 期, 第 34-46 页。

③ 党锐锋、曾辰:《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周边是首要》, 载《东南亚纵横》, 2007 年第 8 期, 第 68-72 页。

④ 沈丁立:《中国周边外交的双环战略》, 载《当代亚太》, 2009 年第 1 期, 第 25-26 页。

⑤ 张文木:《“天堂很远, 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 年第 1 期, 第 5-39 页。

⑥ 傅梦孜:《中国周边战略问题思考点滴》, 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3 年第 10 期, 第 20-21 页。

边国家的政治安全互信。^① 陈兆源指出, 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战略可以从自由贸易区建设伙伴入手, 一方面释放开放经济与睦邻友好的信号, 一方面强化伙伴关系与制度规则上的国际制度竞争。^②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和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之间建立桥梁, 更加侧重于全局思维, 强调综合性策略, 通过系统性、多样化手段实现周边外交目标。在理论层面上, 翟昆认为, 中国周边战略应该在中共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不断创新, 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共同理想, 以探索“地区关系和谐化”为共同路径。^③ 卢光盛与别梦捷认为, 在当前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周边总体稳定且有明显发展优势的新环境下, 中国应将周边作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侧重点, 在以“利益—责任—规范”为核心的新型周边关系理论的指导下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④ 在实践层面上, 刘丰指出, 由于战略目标的多重性和手段的多样性, “目标—手段不匹配”通常是影响中国周边战略决策和执行的难题。中国需要确定周边战略目标的优先次序, 保证资源投入以及手段运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加强国内的资源分配和部门协调, 并尽可能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 从而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⑤ 赵可金指出, 中国要把经略周边放到提升中国战略信誉和权威认同上, 放到构建地缘网络上, 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基础上, 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 将重心放在经营功能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网络上, 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源, 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⑥ 吴志成认为,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需要坚持大周边与小周边的统筹谋划, 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更加积极有为, 强化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平衡处理与周边中强邻国的关系, 重视“新型周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实施多元化、差异化的外交策略, 提供地区安全 and 经济公共产品。^⑦ 凌胜利提出

① 王俊生:《“一带一路”与中国新时期的周边战略》, 载《山东社会科学》, 2015年第8期, 第50-56页。

② 陈兆源:《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选择——基于外交战略的实证分析》,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年第7期, 第131-153页。

③ 翟昆:《中国周边战略的继承与创新》, 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3年第10期, 第26-28页。

④ 卢光盛、别梦捷:《新型周边关系构建: 内涵、理论与路径》, 载《国际观察》, 2019年第6期, 第22-43页。

⑤ 刘丰:《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手段及其匹配》, 载《当代亚太》, 2013年第5期, 第4-21页。

⑥ 赵可金:《中国周边外交战略重在立威增信》, 载《人民论坛》, 2014年第19期, 第30-33页。

⑦ 吴志成:《中国周边外交需更加重视战略谋划》, 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5年第1期, 第25-27页。

周边战略的“双协调”治理策略，把中国周边安全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基于此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①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着重论述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周边外交形势以及相应的对策分析，这些研究主要采取中国视角，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方面，集中讨论中国所期望实现目标的合理性及其应用手段。以中国为中心的分析角度有助于思考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打造对己有利的周边外交环境，然而，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原本已经遭到美国单边主义行径严重冲击的全球安全机制进一步失能、失效，这一情况使外部环境因素日益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特别是对策研究不能忽视的变量。对中国周边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环境变化给中国周边外交造成的挑战和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对策分析仍然比较匮乏且相对滞后，特别是有关“印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地区关系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本身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框架性战略，其目标和手段都处在持续的演化过程中，需要给予实时关注和不间断的跟踪分析。本文着重分析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及其对中国周边国家的认知与政策变动，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同时也试图转换角度，提供基于对方和第三方视角的认知和判断。

三 美国在中国周边推动“印太战略”的布局及其问题

近年来，中美关系日趋复杂，美国对华打压加剧。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对中国进行名为“竞争”实为遏制的全方位打压：战略上，依托“印太战略”编织遏华联盟；安全上，在南海和台海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和试探；经济上，加紧对华切割的同时，阻挠中国与其他经济伙伴的正常合作；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价值观攻击，动辄释放种族主义言论。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持续大力鼓吹“印太战略”，既推动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战略区域，又企图扭转亚太地区以经济为主的议程设置取向。美国的安

^① 凌胜利：《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29—52 页。

全导向政策一方面导致地区形势不稳定，激化了美国与区域内新兴大国爆发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地区原有的区域合作进程受到非经济因素干扰，增大了中国发挥经济优势经略周边的难度。

当前，俄乌之间、俄与美西方之间的对抗已经进入拉锯战阶段，2022 年与 2023 年之交的冬季成为影响冲突走向的“关键期”。美国在欧洲方向大力推行利用俄乌冲突耗俄弱欧的“一石二鸟”策略，同时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在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威胁”，试图将中俄“绑定”为“专制轴心”，从而将国际社会进一步阵营化、集团化。美国同时打压、挑衅中俄的大国竞争策略不仅意在削弱对手，也是强化对盟友控制能力、巩固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通过塑造共同敌人强化本方阵营的战略意图决定了美国不会也不可能考虑在俄乌冲突期间放松对中国的打压。

稳妥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既要看到美国通过“印太战略”施压的严重性，也要看到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对抗战略存在的内在问题。“印太战略”表面上来势汹汹，但远非无懈可击。近年来美国战略实施效果不佳，在国内外均备受争议。除了战略意志犹疑不决和战略目标贪大求全等重大问题外，在战略布势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宏大，从印度洋延伸至太平洋，横跨两大洋，纵横上万公里，实际上却颇类“常山之蛇”，很难充分发挥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常山之蛇”出自《孙子·九地篇》。^①《九地篇》中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常山之蛇”在兵法上流传已久，但孙子所说的“首尾相顾”效应在军事史上很少出现，多数情况下反而表现为击首尾不能顾、击尾首不能顾、击其中则首尾不能相望的“打也打不了、走也走不掉”的被动态势。这并不是因为孙子对“常山之蛇”的构想有误，而是后来人往往不能正确理解该阵势的实现条件和运用手法。运用“常山之蛇”阵势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对力量的平均分配，试图以绵长的阵列形成对敌手的全面威慑，而对手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击其一点就能收到使其不能首尾相救的效果，就可以打破“常山之蛇”的阵势。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虽然在内容和手段上进行了较大调整，但其实质始终没有克服机械运用“常山之蛇”阵势的结构性弱点，

^① [春秋] 孙武著：《孙子兵法》，北京：线装书局，2016 年。

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都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点的缺陷。在手段上，美国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安全和宣传等手段，试图抹黑中国、孤立中国，看起来气势汹汹，但缺乏重点的全面围堵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全世界面前表露出美国“逢中必反”的歇斯底里心态。这一点对于特朗普无关紧要，但对于试图恢复美国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的拜登，“逢中必反”“非中不反”的印太外交是无法帮助美国修补国际形象的，更谈不上在道义上抹杀中国。

在力量的地域配置方面，美国“常山之蛇”阵势表现得尤其明显，美国拼凑了一条从日本到印度的漫长阵线，试图从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南海一直到印度洋全面孤立、挤压和围堵中国。这种策略声势夺人，但具体效果有限。一则即使强大如美国，也没有能力形成如此绵长的对华军事封锁，调动海空力量进行疲于奔命的穿梭式恫吓行动已经产生了威慑“疲劳”，让更多国家看到了美国力量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中国多数周边国家没有随美国“起舞”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看到了美国已经不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二则美国的盟友们更希望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发生在其他方向，而不是在自己的利益攸关区。美国霸权信誉度下降、“印太”阵线内成员利益诉求差别都会制约其战略效果。^①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所有“印太”机制成员和有意参加这一机制的机会主义者都希望看到中美冲突，却没有一方愿意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战火（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作为希望通过寻求美国公开干涉实现“独立”的分裂集团，几乎是唯一的例外）。这一点使得“印太战略”始终难以确定实现遏制中国目标的决定性地域。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中除了美国，其余成员都不具备全球海上力量。印度的海上力量不足以为太平洋伙伴助威，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只能在印度洋维持象征性的存在，而双方又都更愿意看到中国在另外一端卷入消耗性的冲突。这种态势和成员的战略投机心理造成了“印太战略”的一个结构性弱点，就是美国虽然摆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坨力量配置，犹如一副杠铃，两端力量强大，中间却缺乏有效的战略链接。只要这个战略链接枢纽无法发挥作用，两大坨力量就是孤立的存在，难以相互支撑。从战略上，击破“常山之蛇”的要义就在于阻止“蛇头”和“蛇尾”的行动、夺取并巩固“蛇中”地带的战略控制权，而“蛇中”就是在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根据“兵形”与

^①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6 期，第 54—55 页。

“地势”相互影响的辩证思想，只要中国在“印太战略”的“蛇中”阻击美国的围堵，“常山之蛇”便无法首尾相顾，美国的太平洋联盟体系和试图新组建的印度洋安全架构只是两坨分别运作而无法形成合力的力量集团，“‘1+1+1+1’>4”的战略优势难以出现，中国的战略也就变成了如何在亚太这一主要战略方向上应对美国，同时在西南次要战略方向上制衡印度。这是中国数十年来应对的传统海陆结构，中国对此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大量成功案例。

美国的“印太战略”之所以跳不出“常山之蛇”的窠臼，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战略研究者和决策者深植于心的思维定式。美国历来注重与对手进行系统性对抗，奉行零和博弈。^①美国不仅过于强调中美关系的结构矛盾，看不到中美共处的可能性，而且对美国的力量优势盲目自信，认定美国只是由于特朗普时期的错误政策导向而暂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只要美国振作起来，重回多边外交路线，联合盟友和伙伴，就能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这种傲慢使得美国难以制定路线清晰、主次分明的对华战略。

四 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和政策的变动

美国对华恶意行为频出，不仅使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一些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态度上发生了动摇，政策上出现了倒退，甚至在民间催生了反华厌华情绪。坚持对华正确政策路线的国家则受到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经略周边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变量，考虑到中美双方之间实力和影响力的差距，两国博弈的主战场在中国周边而不是在美国周边这一点短期内无法改变。

中国周边已经成为中美对抗的主要角力场。美国对华战略压力的加大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关联考量要素更加复杂，中国在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之间保持战略协调的难度提升。运筹周边首先需要充分而清醒地认识到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本着料敌从宽的原则，预估可能的风险和挑战。第一，美国近年来在南海、台海、新疆和西藏等各个方向和

^① 樊吉社：《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第51页。

不同议题上频繁触动中国底线，挤压中国核心利益，导致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出现因应策略变化。一方面，美国的挑衅动作并不都着眼于赢得和中国对抗的现地优势，其中一部分动作主要作用在于迎合美国国内反华政治气氛，有助于美国执政的政客赢得选举优势，如炒作新疆棉花议题等；另一方面，美国的极限施压和多点挑衅也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地区拼凑反华阵营提供了动员理由，并且咄咄逼人的抵近策略给美国通过对话“碰瓷”创造了条件。未来，美国将更加强调充分发挥美方军事、舆论以及联盟优势，对中国采取更富挑衅意味的行动。美国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要义并非给美国谋取利益，而是着眼于给中国增加困难，从而赢得对华战略优势。第二，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经略好周边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命题。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是美国对外战略“实力为后盾”传统的体现。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实力政治，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实力关系。虽然中国的“亲诚惠容”外交理念获得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认同，但中国如果无法在实力对抗中与美国保持均势，理念上的善意是无法抵御大国博弈的现实主义逻辑的。中国在中美博弈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继续推动周边战略，必须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周边地区主要国家面临美国的威逼利诱，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对华采取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策略的可能性，既要重视地区竞争对手加大对美策应力度、“火中取栗”的危险，也要注意到合作伙伴出于自保而采取对华两面下注政策的可能，并妥善做出应对。

（一）日本

日本既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中坚力量，同时又是亚太地区主要经济强国。日本的亚太战略呈现出了安全与经济诉求相互掣肘的样态。“印太”概念肇始于 2006 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次访问印度^①，此后，日本一直是“印度洋—太平洋安全联盟”的积极鼓吹者，日本也大力推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甚至在美国退出后依然不遗余力地推动协定的缩水版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在安全上积极靠拢美国，在经济上试图重回亚洲主导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多年来也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强调维持与中国紧密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推动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 2018 年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将中日关系定性为“协调”，

^① 乔亮：《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演变和发展的新趋势》，载《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4 期，第 50 页。

并与中国达成在第三方市场合作。^① 日本政府的自相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日本对外战略在安全和经济维度的不协调。日本的矛盾心理虽然不会影响这个国家在重大问题上的选边站队——日本始终会以美国的态度为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但是，日本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倚重仍然使得东京在竭尽所能地避免完全对华切割。这也就为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扩大共同利益，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寻求深化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双方可以积极规划和推动下阶段和“后疫情”时代双边交流与合作，为东北亚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摆脱疫情困扰发挥主导性作用。需要特别警惕的是，日本可能在美国唆使和怂恿下加大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力度，以此作为制衡中国的筹码。

在处理对日方向问题时，以下判断可能会成为中国选择策略时需要考虑的因素：（1）中国不具备改变日本对外战略方向的能力，不论日本从中日经济合作中获得多少利益，日本都不会背弃美日同盟转而在政治和安全上寻求与中国接近；（2）日本在中国周边经略中所占的战略地位已经呈下降态势且其边缘化进程不可逆转，一百多年来日强中弱的东北亚实力格局已经改变，日本不论怎样借重美国的力量，都无法重获亚洲地区主导权；（3）未来中日竞争主要围绕东南亚区域合作进程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等议题展开，东南亚区域将是中日经济角力的主战场。

（二）韩国

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前后围绕韩美关系、半岛局势以及中韩关系释放了一系列消极声音。尹锡悦政府声称，韩国应该积极塑造“印太秩序”，筑牢韩美同盟。^② 普遍认为，韩国新政权缺乏成熟的外交经验和理性的战略思维能力，中韩关系有可能进入一段困难时期。中韩关系陷入新一轮低谷是客观的，但原因不仅仅在于尹政权的经验不足，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决定了韩国只能选择美国一边，在中美之间保持超脱不是韩国可以设想的对外战略选择。即便是奉行“均衡外交”的文在寅政府也认同韩美同盟在地区和平问题上的重要意义。^③ 南北对立是朝鲜半岛的基本格局，朝鲜与韩国的

^① 陈拯、王广涛：《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73页。

^② 杨飞、方长平：《美国“印太”小多边合作的布局与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0期，第3页；李栢：《尹锡悦执政下的美韩同盟与东北亚阵营化趋势》，载《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5期，第110-111页。

^③ 詹德斌：《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载《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第31页。

最大安全威胁就来自对方。朝鲜半岛南方在经济上明显强于北方，但这种优势并没有让韩国强化在半岛统一问题上的决心和耐心，反而催化了韩国的焦虑和急躁心理。韩国既因经济成就而认为应该由南方统一北方，又因军事压力而对北方突然改变现状寻求武力解决问题感到忧虑。

长久以来的焦虑感使得韩国看待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摆脱半岛南北关系框架。经济领域的收益对韩国虽然非常重要，但再大的经济利益也无法抵消韩国在安全方面的天然焦虑感。而在世界大国当中，唯一明确承诺保证韩国安全的就是美国。就此而言，韩国成为美国所有盟友中对美国依赖感最强、最感恩戴德的国家是可以理解的。韩国对韩美同盟的忠实态度甚至超过日本对日美同盟的态度。即使是在面临防卫费用分担、自主权损失等问题的情况下，韩美同盟仍然牢固。^① 这一立场是中国无法改变的。在 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的 30 年间，中韩双方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但两国安全战略始终不在同一个轨道上。韩国不会因为中国是其重要贸易伙伴而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一如中国不会因中韩经济关系而忽视朝鲜的安全感受。归根结底，经济因素对中韩关系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但这种作用的产生有赖于东北亚安全格局的整体稳定。当今中美对抗加剧，东北亚安全态势呈恶化趋势，经济因素的建设性效果明显下降。简单地说，韩国不是因为在军事上“拥抱”美国能够使自己更强大，或者为了从中国“交换”出更多经济收益而选择进一步拉近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也不是不知道亲美立场特别是军事上向美国靠拢会导致中韩关系受损，而是没有其他选择。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按照韩国的利益诉求处理半岛问题，这一点已经决定了在东北亚安全冲突加剧时，韩国一定会与中国渐行渐远。

经略对韩关系，需要给予重视的因素包括：（1）韩美同盟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基石，韩国为了获得美国保护，满足美国的要求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不可能通过正面激励促使韩国减轻对美依赖，惩罚策略能否奏效取决于韩国对中韩关系受损的长期负面影响的承受能力；（2）成为发达国家使得韩国更加自信，未来在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上，韩国主动挑衅的可能性在加大；（3）韩国受制于朝鲜半岛安全格局，主动在半岛以外对中国采取对抗性手段的风险较低，但为美国提供遏华“桥头堡”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将成为常态。

^① 赵懿黑、郑华：《权力变迁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困境》，载《国际论坛》，2020 年第 4 期，第 58 页。

（三）东盟及东南亚国家

东盟整体上一一直对中美博弈持观望态度。中美博弈进入深水区之后，东盟对中美在亚太地区博弈烈度增强表示担忧和焦虑，但自身又难以发挥协调作用，且不希望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东盟保持适度谨慎、尽量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成为合乎逻辑的策略选择。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相关国家并未追随美国的脚步，而是选择观望的态度，东盟地区论坛仅仅表达了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愿望；在疫情应对方面，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跟随美国的舆论节奏，而是选择与中国合作。在具体国家中，最能体现东盟观望态度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菲律宾。菲律宾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强调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既反对美国重返菲律宾军事基地，又不谋求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对抗。菲律宾新政府副总统莎拉与杜特尔特是父女关系，许多学者认为菲新政权不会轻易改变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立场。尽管如此，未来菲律宾的南海政策仍有可能因多方掣肘而生变。美国对菲新政府的拉拢或将成为影响菲律宾在南海问题政策立场的关键因素。在中美就南海问题展开博弈且趋势逐渐紧张背景下，菲方有关政策仍存在较大变数：其一，菲律宾国内不少政要和军方长期受到美国影响，主张维护并强化美菲同盟，在南海问题上寻求美国支持，保持强硬立场；其二，鉴于菲律宾此前曾就南海主权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在国内舆论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非法仲裁”仍有可能被菲方再次提及，成为其新一轮主权声索和对华强硬的基本依据；其三，面对美国对菲律宾持续不断的政策压力，菲律宾将有可能重新考虑强化美菲同盟的战略效能，在中美南海摩擦不断升级之际，直接或间接参与在南海海域由美国主导的、旨在遏制中国南海维权的军事行动。

越南则长期利用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海战略意图的不信任，致力于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越南明确提出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海洋岛屿的主权”，并将主动加强国防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作为其“国防、安全和外交”的指导方针和“融入国际”战略的重点。具体表现为：其一，加强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舰访问外交，地点选择在金兰湾、岘港等具有特殊意义的港口；其二，在军售上继续保持与俄罗斯、印度密切关系的同时，接受美西方的军事援助；其三，加大在争议海域与西班牙、俄罗斯等国油气公司进行油气勘探与开发活动（虽然中国采取措施制止了上述活动，但也因此遭受了大量国际指责与“抹黑”）；其四，利用国际舆情，干扰“南海各方行为

准则”(COC)谈判进程。当然,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运用“国际化”手段是有限度的,基本坚持了三个“不会”: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会牺牲发展利益而片面追求所谓南海“主权”利益,不会违背中越关系发展的大局。越南对中国有多层次的利益需求,南海争端只是中越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因此,中越之间的合作仍然发挥基础性作用,越美之间围绕南海问题的政治与国防合作虽然表现热络,但是越美政治互信程度不高、越南拒绝选边站队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①

经略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处理和中国存在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的关系,中国可能需要加以重视的策略要点包括:(1)东南亚是中国和美国在中国周边周旋的主要场域,中国能否成功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东南亚地区对中国主张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是关键;(2)中国在东南亚深耕多年,已经拥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基础,与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形成了密切的多维多重关系网络,是中美力量特别是影响力对比中相对有利于中国的区域;(3)在东南亚与美国博弈,中国不能仅以提供经济利益或者发展机遇为手段,更不能接受一些东南亚国家所谓“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错误认知,而是要强调经济和安全手段的相互支撑、相互关联,避免出现经济海外存量越大、安全压力反而越大的困境。

(四) 印度

多年以来,中国对印度政策始终怀有善意,认可并赞赏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把印度看成是中国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过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在涉及诸如克什米尔归属等印度核心关切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议题上,愿意尽可能对之进行安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方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拉住、稳住印度的效果。莫迪的印人党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对华采取了咄咄逼人的“问题外交”策略,列出印度对华不满的问题清单,要求中国加以解决,以此作为判断中国对印政策性质并做出反应的依据。^② 2017 年年中印度制造了洞朗事件,中方争取事件和平解决的善意努力被印度误判为中方无意在中

^① 顾强、章钊铭:《“成本强加战略”下美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与局限》,载《南洋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58-61 页。

^② 叶海林:《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载《当代亚太》,2017 年第 6 期,第 24-47 页。

美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对印挑衅行为采取报复乃至惩戒行动，印度可以利用中方不寻求对抗的心理，对华采取更大规模的讹诈行动。^① 因此，洞朗事件发生后，印度一边积极响应中方的呼吁，促成中印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另一边则在实控线加大渗透蚕食力度，不断升级越线挑衅的动作，至 2020 年年中酿成了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对峙事件，导致双方出现人员伤亡。印度悍然违反中印双方有关协定，在实控线鸣枪，气焰日渐嚣张。

印度的对华政策和日本比起来，包含着性质相同但表现有所差异的逻辑悖论。印度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心存期待，但对支持美国战略构想可能付出的代价顾虑重重。同时，印度对华态度的两面性逐渐凸显，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地区的进展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也不愿意明确支持美国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对中国的围堵。印度与希望在安全议题和经济议题之间保持平衡的日本不同，其对外战略更多强调以安全手段获得经济利益，或者以经济为筹码增大安全收益，以安全议题经济化或者经济议题安全化的路径来实现印度国家利益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相互促进。印度对华的零和战略思维降低了双方通过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的可能性，提高了两国边境对抗的军事冲突风险。

未来，中印关系将可能面临更大挑战，维护中印关系基本稳定的难度将随之增大。经略印度，中国在进行目标设定和策略选择时需要关注的要点包括：（1）印度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中国也不是印度崛起道路上的关键助力，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可塑性，中印两国对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诉求，中印合作缺乏稳定且可持续的战略共识；（2）中国应该努力强化对印塑造能力，致力于通过多种手段确保中印关系稳定，适当降低对印战略预期，避免以势胜力的机会主义策略占据印度对华政策的中心；（3）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拉住印度不是中国合理的政策目标，但稳住印度依然可能，在现阶段中国更应该考虑采用主动作为的牵制手段、慑止或对冲印度对华挤压的应对策略，而不是试图向印度提供好处以换取印度对华善意。

未来，周边作为中国外交首要方向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将会更加突出。中国应以开放的周边外交制衡美国的脱钩战略，以共赢的周边外交对抗美国的零和策略，使中国周边国家切实感

^①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4 期，第 106 - 128 页。

受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同时，需要善于运用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内的硬实力，防止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能力和战略决心产生误判，误认为可以在中美博弈激化时对华进行讹诈，从而给中国推进周边战略造成干扰。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经略周边，中国要做到诚与信、威与惠的结合，体现正确义利观下的大国担当。

五 中国加强对美博弈、深入经略周边的若干对策性思考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美国对华战略的对抗本质进一步凸显，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将明显增加，以往建立在避免安全成本过度增加影响经济发展的周边稳定维护策略，将不得不向着增大安全收益、拓展安全空间的周边安全塑造策略转换。形势和目标的变化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增强主动塑造能力，依托战略支点国家，拓展安全活动空间和手段，打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我有利”的周边安全网络，以对冲美国及其联盟体系对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

（一）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

尽管经过艰苦努力，中国避免了中美战略“摊牌”，然而需要看到如下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并未消除：首先，中美经贸关系的缓和是暂时的，美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对华全方位遏制的长期策略；其次，中美对抗已经向双边关系其他领域蔓延，在中国周边安全、意识形态、国际话语等领域未来将更加激化；再次，美国迫使中国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态度将日渐强硬，中国和美国进行战略周旋的空间将不断遭到美国及其联盟体系挤压；最后，随着中美对抗趋势的加剧，中国周边地区少数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试图通过主动制造摩擦寻求中国让利的机会主义心态将愈发明显，导致中国周边出现安全突发事件的概率上升。

多年以来，在“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周边安全策略主要以避免出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和平稳定环境的安全事件为目标，一旦出现与中国有关的类似事件，不论起因如何、性质怎样，中国的主要应对手段都终都会回到事态管控上；与中国无关而涉及周边国家间矛盾的问题，中国主要采取避免卷入过深的中间立场，如柬埔寨和泰国的柏威夏寺争端；在不涉及国家间矛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则以提供无争议的技

术和物质支持方式体现国际地位和国家担当。

这种思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了中国不在周边地区支付过高安全成本、避免成为安全焦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但是周边稳定维护策略也限制了中国扩大安全利益、拓展安全空间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不愿意周边出现安全事件的心态有可能为一些国家所乘，成为他们试图通过制造安全事件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状态从而讹诈中国的根由。事后管控局势的被动维护稳定思路有可能导致中国远迈国境的经济利益不断在周边国家遭遇挑战，甚至个别国家企图以此作为向中国谋求与其实力不相符的不当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周边环境日渐复杂的背景下，假如中国继续以周边维稳为主要诉求，则既无法实现稳定，也无法确保安全。需要看到，周边的稳定并不等于自身的安全，一个对自己不利的稳定态势实际上是有害的。中国作为一个处于上升阶段且国家统一尚未实现的复兴大国，周边的相对稳定状态只是中国以和平方式提高实力阶段的外部条件，既不是这一阶段的目标本身，更谈不上长期不变的战略任务。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向国土疆界以外的扩展，以及当前国际体系主导力量和中国矛盾的加深（这两点都是中国实力增强必然引起的后果），中国无法规避亦无需规避国际体系霸权国家和崛起国之间因为实力日渐接近而导致的对抗和冲突，与此同时，中国对周边态势的掌控能力也必然和必须上升。因此，中国应该致力于实现经济利益空间扩展和战略安全空间扩展的同步，以及增强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秩序的能力和意愿。

（二）强化对周边安全秩序的主动塑造意识和能力

中国主导塑造周边安全秩序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致力于在周边建立一个拱卫自身安全、排斥其他大国的安全联盟体系，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无此需求，实际上也无此能力。中国的策略目标从低到高、从目前到中期应该设定为：第一阶段，防止美国在中国周边建立共同对华的联盟体系，阻止美国诱导或胁迫中国周边国家站在美国一边孤立中国；第二阶段，建立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适应的周边安全网络，实现战略安全空间和经济利益空间相互适应，拥有以安全特别是军事手段维护海外人员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能力和手段；第三阶段，建立中国主导的周边安全体系，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纠正周边国家所谓“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错误认知。

为了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可以考虑加强如下方面的能力建设：（1）军事方面，包括海外快速部署与干预能力、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能力、海外大规模投送能力、海外非接触定点清除能力；（2）情报方面，包括早期预警能力、应急沟通能力、人脉建设体系；（3）物资和技术层面，常态化的海外行动保障设施和体系；（4）外交方面，以中国为主的区域小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双边或小多边安全保障法律框架；（5）国际话语方面，独立的国际话语传播和共享平台、灵活而国际化的舆情引导能力。

强化上述能力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能力累积和力量使用的交替作用，不存在中国将上述力量需求都满足以后再根据情况逐次使用力量的可能性，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也不会给中国待到万事齐备再从容施展方略的时间窗口。能力的提升是在能力使用的过程中实现的，使用能力必然会带来反弹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冲突风险，但克服这种反弹也将给中国带来区域可信度增强的收益。周边国家并不指望中国能在短时间内将美国的战略施压击退，实际上中国只要通过不妥协的相持展示出坚强的抵抗决心，就足以不断强化中国的战略可信度，争取战略伙伴的更积极主动配合，从而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网络的构建。

（三）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

根据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需要认识到，中国并不需要一个类似于北约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国也没有主导一个地区安全联盟的能力。中国拓展安全边界、增强安全能力、塑造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实现路径应该是借助不同方向上的战略支点国家，构建以双边为主的周边安全合作网络。

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秩序，离不开战略伙伴的支撑和合作体系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战略伙伴的布局并不需要面面俱到，更不是伙伴越多越好。具体而言，放眼全球，俄罗斯作为军事和外交能力突出的世界大国，与中国在事关国际秩序的全局性问题上存在重要共识，是中国的首要合作伙伴。多年来，中俄政治和安全关系良好，所欠缺的是两国民间友好和互信程度。特别是要注意，在中俄两国的知识精英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相疑虑的倾向，需要双方从社会舆论角度加以引导。另外，在外交上，双方应在全球范围内加强针对美国扰乱国际安全秩序行为的协调，避免出现一方在另一方和美国对抗之时通过纵容、支持美方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试图缓和与美国关系的行为，从而给美国提供“拉一个打一个”的机会。

除了俄罗斯作为全球性力量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外，根据地区战略方向不同，中国还应选择不同的区域战略伙伴及伙伴关系框架。在中亚方向应该坚持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要合作伙伴框架，通过中俄关系稳定中亚战略基本格

局；在南亚方向以巴基斯坦为战略支点，通过中巴合作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冲美国的中南亚战略和印太战略，并防止印度在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区域在美国许可下获得地区主导权；在东南亚方向坚持深化与东盟整体合作的同时，重点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的合作，以显示中国的大国担当以及对区域格局的尊重和对友华力量的回报，从而为本地区其他摇摆国家如菲律宾和越南树立示范；在东北亚方向应继续支持朝鲜维护独立和安全的努力，以维持东北亚地缘安全格局的平衡，以力量平衡实现态势稳定。

中国应加强与上述国家的双边安全互动，在时机成熟的方向适度扩大军事力量的常态化存在，提升情报合作水平，增加军事和安全能力的储备，搭建以双边为主的安全合作法律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国家的合作不能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满足于提供物质层面的支持，而应该说做并举，为中国的行为争取道义高度，旗帜鲜明地体现自己的大国担当。中国应以自身为中心，通过双边安全合作，构建辐射状的地区安全架构，并依托这一架构与美国推动中的印太安全联盟体系展开长期博弈。

总之，在俄乌冲突后美国加剧全球分裂与对抗的背景下，中国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早在2014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确立了周边地区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工作方向，这是对党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外交方针的进一步明确。任何大国的崛起首先意味着周边局势塑造能力的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事务的参与既要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需求，又要注重为周边提供公共产品、塑造周边秩序的能力建设，满足周边地区对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秩序稳定两方面不断增加的需求，努力使中国和周边地区形成更加紧密的复合型共同体。

（责任编辑 黄 念）